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保持经济发展韧性活力基础稳潜能大

蒋永穆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一系列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组合拳”应出尽出,有效提振社会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四季度增长5.4%。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这一成绩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优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亮点纷呈。多领域的丰富实践推动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最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4年前11个月汽车出口584万辆,居世界首位并再创历史新高。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

中国经济能够稳健运行,关键在于经过长期发展,已积累形成了一系列基础条件,具备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实现持续向好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基础稳,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底盘稳。一方面,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经济总量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具备“超大规模”特征,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7%跃升至2023年的16.9%。1979年至202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另一方面,内部经济和向外经济可实现良性互动的双循环,嵌入全球市场的程度较深。2024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38468亿元,比上年增长5.0%。其中,出口254545亿元,增长7.1%;进口183923亿元,增长2.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4%,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3%。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跨境

电商在“卖全球”方面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在“买全球”方面的优势也在持续发挥。此外,我国持续提高初级产品供给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大力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安全发展的基础保障不断夯实。

优势多,为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支撑。我国有大国经济共有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制度优势。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市场规模巨大。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规模稳步增长,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22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对商品、服务的需求从“有没有”加快向“好不好”转变,消费提质升级趋势明显。从投资需求看,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2024年为67%,虽然较过去不断提升,但仍远低于美国约83%的城镇化率。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升级空间很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还有较大投资需求。同时,我国人才队伍优势显著,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当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是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高素质劳动者规模庞大,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研发人员总量多年居世界首位,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毕业生规模全球领先。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提高经济发展活力和效率,进一步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韧性强,我国拥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产业体系完备,经营主体类型多样,适应环境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大部分产品在国内就可以实现全产业链配套,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制造业加快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能力位于世界第一梯队,智能制造推广力度加大。已打造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成72家“灯塔工厂”,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2%,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另一方面,居民的高储蓄率也使我国能更好适应经济波动的影响。客观上看,较高的国民储蓄率能为各类投资活动和资本要素积累创造空间。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金融储备,提高了投资和生产效益,让我国在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能够更好抵御风险。

潜能大,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发展的客观现实。这是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更好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所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典型体现。无论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还是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都需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至2024年的67%,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城市数量增加至694个。县域经济直接推动了庞大内需市场发展,《2024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46.3%。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客观上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回旋余地。经济欠发达省份能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或地理位置优势,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力量。在西部地区,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快速发展,同时已形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9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和电子信息、航空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4年前三季度,西部12个省份中有10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重庆、新疆、贵州、甘肃、宁夏等省份增速排在全国前10位,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立足现有基础,用好发展优势,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与活力,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最大程度发挥各项政策的整体效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在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方面切实发力。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以高质量发展来巩固和扩大稳定的基础。

(作者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要素通过协同赋能、创新转化,不断发挥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数据产业是将数据转化为资产,将数据资产加工为数据产品和服务,并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相关产业赋能的行业总和,是数据要素流动、配置和利用的重要载体,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潜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围绕数据要素开发和价值挖掘的企业不断涌现,我国数据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相关制度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数据资源总量持续增长。数据产业已初步构建起覆盖数据采集汇聚、计算存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安全治理等环节的产业链,企业规模逐步壮大,产业生态日益成熟。

发展规模显著扩大。据统计,2024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1万亿元,到2023年已突破2万亿元。预计2024年至2030年间,数据产业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到2030年产业规模有望达到7.5万亿元。截至2023年,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2023年,全国数据产业总量达32.852B(字节),同比增长22.44%。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超过88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达268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这些数字表明,我国数据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逐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发展未来产业的着力点和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政策支持更为精准。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专项政策,支持数据产业和企业快速发展,助力传统行业在效率提升、流程优化和组织变革方面转型,成效显著。现代农业领域,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商贸流通领域,多源数据实时精准服务,优化供应链管理,改善消费者体验;交通运输领域,江海联运数据的打通有效助力航运物流降本增效;金融服务领域,搭建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数据技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金融资源精准配置。

产业发展全球化拓展。各国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纷纷出台数据产业促进政策,推动本国数据企业抢占全球数据产业制高点。在此背景下,全球数据产业发展已突破地域限制,数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不断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及国际规则制定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相关政策逐步完善,根据初步统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增长10.8%。这一趋势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数据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数据规模的快速增长和流通效率的不断提升,数据产业形态迭代演进,对强化数据安全、提升数据标准化、加快数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更加迫切。

一方面,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不强,是当前数据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国内外数据泄露事件涉及金融、工业、教育等多个领域,不仅会损害个人和企业的权益,还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2024年发生大规模用户数据泄露事件,约7300万用户的信息被泄露,对公司声誉和用户信任度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数据孤岛依然存在以及标准化不足,是限制数据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主要瓶颈。统一的数据标准与规范,开放的数据授权机制、互联互通的数据空间,是数据企业发展壮大和数据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的迫切需求。截至2024年7月,我国已有243个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的有效数据集超过37万个。但仍有不少高经济价值的数据资源难以实现流通、共享、融合,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数据兼容性差,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循环,不利于营造竞争有序、繁荣活跃的数据产业生态。此外,加强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已成为推动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的人才供给数量、梯队结构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充分发挥数据产业引擎作用,需聚焦主体培育、政策配套、市场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等领域的难点问题,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一是积极培育数据产业主体,构建重点企业跟踪服务机制,围绕数据产业重要环节流程,建立长效沟通联系服务机制,引导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加快形成良好数据产业生态。二是提升数据产业治理水平,进一步健全鼓励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明确数据产业发展方向、支持措施和监管要求,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与规范。三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环境,培育形成公平、透明、高效、安全的数据市场环境。四是加快数据人才培养,统筹数据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健全数据人才认定标准,形成与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适配的人才梯队。五是推动数据技术创新融合,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在数据处理、分析、挖掘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与合作,加强数据核心技术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培育数据服务、数据咨询、数据治理等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数据产业链拓展和价值链跃升。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提升开放能力重在制度创新

杨丹辉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同时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作出重要部署。需以制度创新提升开放能力,更好凝聚开放共识,形成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合力。

回顾对外开放历程,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形成以增量带存量、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渐进式开放模式,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正向效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加速发展。199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606亿美元,攀升到世界第九位。2009年货物进出口规模扩大到2207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2.4%。2024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0%。随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持续增强。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推进,规模扩大、质量提升、结构优化、话语权增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当前,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数轮侧重点不同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如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等新兴领域怎样创新国际合作

方式等新问题上还存在困惑,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在障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成本高企、难度增大等问题还有待解决。从国际环境看,开放发展是世界和时代的主流,但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地缘冲突损害国际分工效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侵蚀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果。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以更有力的制度创新,突进“深水区”,推动开放制度体系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加强顶层设计扩大自主开放。历史地看,世界大国均有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服务于不同战略目标推进单边开放的制度安排。推动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自主开放,可考虑在实施进一步扩大免签证国家范围等政策措施基础上,加快经验复制推广,充分释放政策效应,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外经贸、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中敢闯敢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有序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拓宽开放渠道,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形成工具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撬动力大、合规性强的“开放政策包”。

瞄准痛点堵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整体上相对滞后,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也还有开放空间。这些既是存量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形成新一轮增量效应、释放潜力、提振信心的突破口。需深入实施外商投资法及

实施条例,进一步合理缩减负面清单,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着力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探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药健康等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合作新机制,促进新兴领域资本、技术、人才跨境流动;构建新型投资便利化的长效机制,增强政策合规性、透明度;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南国际消费博览会等,打造新型国际合作的综合性公共平台。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改革激发主体活力,在开放中加快技术进步,不断完善国内配套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能力。面对个别国家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推行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不利影响,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作,积极推动双向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具备产业链领导力和整合力的链主企业,打造创新、包容的供应体系,增强对全球供应体系的塑造力。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在开放初始条件、要素禀赋、经营主体构成、改革与开放协同性、制度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长期存在。因地制宜是解决对外开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实践要求和推进路径。需发挥沿海、沿江、沿边和交通干线等优势,加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实现扩大开放重大战略举措

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融合对接,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加快配套服务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对外开放合作的新门户。

引领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面对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可将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的开放合作作为重要抓手,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推动前沿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设立和开展,完善气候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扩大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资本、人员交流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创造性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验的国际社会共享。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制度创新提升开放能力,还要坚持统筹开放与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着力完善贸易救济、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以及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不断创新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